



杜海军 著

吕祖谦年谱

中华书局

年谱丛刊

吕祖谦年谱

杜海军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祖谦年谱/杜海军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8
(年谱丛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720 - 1

I. 吕… II. 杜… III. 吕祖谦(1137~1181) - 年谱
IV. B244.9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3885 号

责任编辑 李解民

年谱丛刊

吕祖谦年谱

杜海军 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1¼ 印张·2 插页·300 千字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 定价:25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720 - 1

网络销售合作伙伴

博库书城 www.bookuu.com
当当网 www.dangdang.com
卓越网 www.joyo.com

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
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出版

像 萊 東 呂



吕伯恭画像赞：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。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，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世。——朱熹

序

李裕民

自从宋神宗元丰七年(1084),吕大防编成《韩吏部文公集年谱》、《杜工部诗年谱》以后,编纂个人年谱蔚然成风,到宋孝宗淳熙十年(1183)为止,一百年间,共出现了61种年谱,从此,年谱成为传记体中独立的类别,至今不衰。如果按所写谱主的时代作区分,早期以谱写宋朝以前的名人为主,北宋到南宋高宗时34种年谱中,谱主为宋人者仅占12种,至宋孝宗时,本朝人为谱主成为主流。27种年谱中,谱主为宋人者占了17种(计算至淳熙十年)。这一百年中,宋人所作本朝人年谱共29种,其中现存的尚有12种,《东莱吕太史(祖谦)年谱》就是其中的一种。其他谱主为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陈师道、李纲、程颐、陈襄、郑刚中、宗杲。他们都是一流名人,年谱是研究这些名人的必不可少的资料。

宋人所作年谱虽然篇幅不大,但史料价值甚高,因为作者与谱主时代相同或相近,他们所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,可信度高。《吕太史年谱》四五千字,为其弟吕祖俭与乔年所撰,叙其生平事迹,如铨试下等第三人,上等第二人,解试第二人,奏名第六人,以及先后出任各官职时的10件制词等等,都是后人无法想象,在其他史料中难以找见的。

研究谁,找谁的年谱,这一道理,人所共知,无庸赘说。我要强调的是,研究其他方方面面的,也大有用处,这一点人们似乎不太

注意,对苏、黄以外的年谱尤少关注。在这里仅以《吕太史年谱》为例,说明宋人年谱所具有的多种价值。

《吕太史年谱》中收入了宋孝宗作的一首诗,《比以秋日临幸秘书省因成近体诗一首赐丞相史浩以下》:“玉轴牙签焕宝章,簪绅列侍映秋光。宴开芸阁儒风盛,坐对蓬山逸兴长。稽古右文惭菲德,礼贤下士法前王。欲臻至治观熙洽,更罄嘉猷为赞襄。”《全宋诗》册43页26868据元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五收入此诗,两相对比,可知后者诗题缺了“比以”二字,诗中“列侍”误作“侍列”,“猷”误作“谋”。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六页221亦收此诗,与《吕太史年谱》全同。年谱更提供了作诗的时间是淳熙五年九月四日。编《全宋诗》时如果注意及此,质量就可能更高些。

又如有人为《南宋馆阁录》的作者陈騏作《编年事略》,而《吕太史年谱》即可补充两条,即淳熙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陈騏作《吕祖谦除秘书省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制》,五年十月十七日作《吕祖谦除著作郎兼职如故制》。

又如研究宋孝宗的御批,从此谱中可找到一条,淳熙六年二月三日,以吕祖谦编类《文海》有功,与除直秘阁。而被中书舍人陈騏缴回,认为推赏太优。孝宗即批旨云:“馆阁之职,文史为先。今所编次,采取精详。观其用意,有益治道。故以宠之,可即命词。”而今《宋史》本传收此批示比较简略,省去了“观其用意”一句,又改“今所编次”为“祖谦虽进”,不如年谱完全保留原貌。

在这里,还必须提到,《宋史》卷四三三本传说:陈騏接到圣旨以后,不得不草制,但他还是在制词中表示不满。制词都有固定的套路,很难表达个人意见,他是怎么表述的呢?表述了什么?没有说,而年谱则收入了这一制词,全文如下:“敕:朝散郎吕某:馆阁之职,文史为先。以尔编类《文海》,用意甚深,采摭精详,有益治道,

寓直中秘，酬宠良多。尔当知恩之有自，省行之不诬，用竭报焉，人斯无议。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直秘阁。”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五页 596 所收不全）显然，重点在“尔当知”以下四句，意思是要想让人背后不评头品足，必须“省行之不诬”才行。这里，撇开是非问题不说，单论一位士大夫，在皇帝制度下，敢于坚持己见，在制词中仍顽强表现自己，在极端专制的明、清两代是不可能见到的。这为研究和深入解剖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问题，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。

又如研究宋代科举制度，在年谱中也会有所收益，在《宋史》本传中只有“中进士”三字，而在《吕太史年谱》中可以得知，他曾经跨地域考试。吕是婺州人，因随其父在福建任上，参加了福建漕试，获第一名。次年参加礼部试，未中。又过了五年，至两浙路参加考试，第二年中进士。本来，宋代实行分地域考试制度，各地都有固定的名额，为什么他可以跨地域？是投机取巧吗？不是，他是作风正派、人品高尚的人，年谱记事并无忌讳，说明时人对此事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。这就是说宋代既有地域规定，又有一定的灵活性。当时到底灵活到什么程度？这样做有何利弊？值得深入研究，今天我国高考是不容许跨地域的，总结宋代的历史对现实也会有某种借鉴作用。

又如考证名人的生卒年，如林之奇（字少颖），《宋史》卷四三三本传说淳熙三年卒，年六十五。因此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和《全宋诗》册 37 页 22965 都据此定其生卒年为 1112—1176 年。然而吕谱则另有一说，淳熙四年（1177）条云：“是岁，林先生少颖卒，有祭文。作文在明年夏。”在《东莱集》目录此条下注：淳熙五年（1178）夏。按：吕祖谦是林之奇的学生，林又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学生。林卒于福州，而吕在婺州，相距不到一千里，在当时的

交通条件下,林的死讯需要几个月才能传到婺州,故吕在五年夏才写祭文。倘若卒于淳熙三年,隔了一年多,消息才传到,离事实就太远了。疑《宋史》本传之“三”当为“四”之误,其生卒年应为1113—1177年。

宋人年谱的优点说了许多,为什么我们还要重修?一句话,因为旧谱太简略,一般仅数千字,最短的不到一千字,信息量少。宋人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,他们所撰年谱,也呈篇幅逐渐增大的趋势,如绍兴八、九年(1138—1139)编的《王荆文公年谱》1000多字,到淳熙十年(1183)的《大慧普觉禅师年谱》达20000余字,至南宋末的《陆象山年谱》已超过40000字。清人所修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增至数十万字。这一发展趋势与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越来越高有关。杜海军君顺应这一潮流,广泛搜集材料,在充分吸取旧谱优点的基础上,编写成二十万字的《吕祖谦年谱》,字数增加40倍。从新谱中,我们不仅能看到更详尽的吕祖谦生平事迹,还能展现时代的特点、家族系谱、交友状况、学术思想的变化等等。这对后人系统了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,这位少有的能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友好相处,在交流中提高、升华的虚怀若谷的大师,是大有助益的。

2007年3月4日于西安陋室

前言 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传

吕祖谦是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,生时与朱熹、张栻被共尊为东南三贤,又与朱熹、陆九渊在乾道、淳熙间鼎立而三,谓为南宋学术的三分之一并不夸张。^① 长期以来,人们多重在史学、理学或心学方面对吕祖谦展开研究,其实,吕祖谦的学术核心乃是中原文献之学(或称中原文献之传),这是吕祖谦的自我表述,也是南宋至今的学者共识。其弟吕祖俭为作《圉志》云:“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,习于家庭,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。”元代彭飞说:“祖谦以中原文献之旧,岿然为渡江后大宗。”^②《宋史》本传说“祖谦之学本之家庭,有中原文献之传”。明代孙承恩说吕成公“中原文献惟子是绍”。^③ 意思皆是说吕祖谦承中原文献之传而来。中原文献之传是吕祖谦得以与张栻、朱熹、陆九渊并被时人称誉,立足南宋,昂首儒林,岿然自为一家之根本。因此,欲明吕学,必究中原文献之传。然时人论及中原文献之传,则普遍释为图书资料。最具代表性者,

① 或云将吕祖谦学术视作南宋学术的三分之一为不妥,一是乾道、淳熙间学术不等于南宋学术,一是认为忽视了陈亮等人。笔者以为,所以如此说,道理在于乾道、淳熙学术在南宋是最活跃时期,成就可以代表南宋而无愧色。至于陈亮等人实为吕祖谦后学,自不能与吕祖谦等论。

② 彭飞著《历代制度详说原序》,《历代制度详说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③ 孙承恩《文简集》卷四十一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如《吕祖谦评传》说：“值得说明的是吕氏家族一贯提倡读书，注意对历史的研究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，而有‘中原文献之传’的美称。”并解释了为何独吕氏能积累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的原因。^①中原文献之传是宋及后人称许学有渊源者的常用词，如黄榦说朱熹的父亲朱松“得中原文献之传”，谢枋得说自己“忝中原文献之传”，赵孟頫说陈元凯“得中原文献之传”等，皆是从学术角度言。说吕氏家族提倡读书、注意对历史的研究是对的，或许家藏也颇丰，但是，说吕氏家族因积累众多鲜为人知的资料而有中原文献之传的说法，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，是肤浅的、以偏代全、以现象代本质的解释。这种解释，忽略了吕学的本质。吕学也因之被遮去了光彩，研究者于是便失去了方向。所以，澄清何为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传，就成了研究吕祖谦的必要。

究竟什么是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传？吕祖谦早有其说。《祭林宗丞文》叙述老师林之奇得吕本中学术传授渊源如此云：“呜呼！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，载而之南，裴回顾瞻未得所付。逾岭入闽，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，一见意合，遂定师生之分。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，庆历、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容。以广大为心，而陋专门之暖昧；以践履为实，而刊繁文之枝叶。致严乎辞受出处，而欲其明白无玷；致察乎邪正是非，而欲其毫发

^① 潘富恩、徐余庆说：“金兵灭宋之际，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、书香门第家破人亡，这些被毁灭的家族所藏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。而吕氏家族则不然。由于吕好问先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，而保全了吕氏一身的身家性命。后吕好问携家南下时，宋高宗已经即位，南方趋向安定，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。”《吕祖谦评传》（16—17页）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1月。我有一种想法，中原文献之传的提出，似乎与异族入主中原有些关系。

不差。”^①这段文字告知我们,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传,有两个主要特点:一是以广大为心,二是以践履为实。这是吕本中、林之奇的学术渊源,也是吕祖谦的学术根底。考吕祖谦学术,无不符者。

一 以广大为心

以广大为心是吕祖谦学术的基本态度。吕祖谦主张学者应摒除门户之见,做到泛观广接,多与异道相处。他嘱陈傅良要“公平观理,而撤户牖之小”。^②说刘子澄:“吾侪所以不进者,只缘多喜与同臭味者处,殊欠泛观广接,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,而根本渗漏处往往卤莽不见。要须力去此病乃可。”^③

吕祖谦具此学术取向,主要源于其家学影响。

吕氏家学是一个自吕公著始,经吕希哲、吕本中等,几代人努力而形成的,具有以广大为心,而陋专门之暖昧特点的学术流派。

吕公著(1018—1089),字晦叔,吕夷简子,吕祖谦六世祖。在《宋元学案》中与范镇等人,并立为《范吕诸儒学案》,是吕氏入学案的第一人。为学讲究择善而从,《宋史》本传称:“公著自少讲学,即以治心养性为本,平居无疾言遽色,于声色纷华,泊然无所好。暑不挥扇,寒不亲火,简重清静,盖天稟然。其识虑深敏,量阔而学粹,遇事善决,苟便于国,不以私利害动其心。与人交,出于至诚,好德乐善,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,必问其所知与所闻,参互考实,以达于上。每议政事,博取众善以为善,至所当守,则毅然不

① 吕祖谦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卷八,《续金华丛书》本。

② 吕祖谦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十,《续金华丛书》本。

③ 吕祖谦《与刘衡州子澄》,《东莱吕太史别集》卷七,《续金华丛书》本。

回夺。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，如权衡之称物。”^①

吕公著幼年嗜学，至忘寝食。长成后，为官之余遍交天下学人。他很欣赏、推重理学的几位开山人物，且多予帮助。如荐举张载，为神宗召问治道；同富弼、司马光一道，在洛阳为邵雍营造安乐窝。熙宁初任御史中丞，首举程颢为太子中允，监察御史里行。哲宗初，与司马光共举程颐，称赞程颐的道德品行，以为“力学好古，安贫守节，言必忠信，动遵礼义，年逾五十，不求仕进，真儒者之高蹈，盛世之逸民”。^② 哲宗因下诏任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。其实，在程颐三十四岁的时候，吕公著就称赞程颐“有特立之操，出群之资，洞明经术，通古今治乱之要，有经世济物之才。非同拘儒曲士，徒有偏长。使在朝廷，必为国器”。^③

吕公著与各学派人物都有良好的关系，并得到对方敬重。他首先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。《宋史》本传载，吕公著登进士第，召试管职，不就。通判颍州。时值欧阳修知颍州日，遂与欧阳修为讲学之友。后，欧阳修出使契丹，契丹主问到中原的学行之士，欧阳修以吕公著为第一人。以为其“器识深远，沉静寡言，富贵不染其心，利害不移其守”。^④ 他也曾与司马光同心辅政，因其讲说尤精，语约而理尽，司马光说：“每闻晦叔讲，便觉己语为烦。”他与王安石的交情也颇不一般，王安石以兄事之。史载“安石博辩骋辞，人莫敢亢，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。安石尝说自己‘疵吝不自胜，一诣长者，即废然而反，所谓使人之意消者，于晦叔见之’。又谓人曰：‘晦叔为相，吾辈可以言仕矣。’”后以政见不同，与王安石关系

① 《宋史》卷三百三十六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。

②③ 《伊川先生年谱》，《二程遗书》附录，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④ 《除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事军国事制》，《皇朝文鉴》卷三十六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转恶,但私交从未断绝。吕祖谦追忆父亲吕大器谈到吕公著与王安石交往时说:“平生交友如王荆公、刘侍读、曾舍人,屈指不满十,虽中间以国论与荆公异同,元丰末守广陵,钟山犹有书来,甚惓惓。且有绝江款郡斋之约会,公召归乃止。”^①吕公著很重视王安石,因遣子希哲前往就学。

吕公著还好佛学,且因为官故,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徐度《却扫编》卷上载:“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,及为相,务为简净,罕与士大夫接。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。于是,好进之徒,往往幅巾道袍,日游观寺,随僧斋粥,谈禅说理,覬以自售,时人谓之钻禅云。”足见吕公著的好佛远非一般可比。

吕公著遍交天下学人,亲与其子择师,为吕希哲开创不名一师的家学风格打下了基础。

吕希哲(1039—1116),字原明,吕公著长子,吕祖谦五世祖。学者称荥阳先生。《宋元学案》为立《荥阳学案》,《宋史》三百三十六有传。

吕希哲广从天下学者游,遍访各家学问。少年时曾经拜见欧阳修。吕本中《童蒙训》卷上记载:“荥阳公尝言,少时与叔祖同见欧阳公,至客次,与叔祖商议见欧阳公叙契分、求纳拜之语。及见欧阳公,既叙契分,即端立受拜,如当子侄之礼。公退,谓叔祖曰:‘观欧阳公礼数,乃知吾辈不如前辈远矣。’已而师事焦千之。焦千之,字伯强,颍州焦陂人,是吕公著的讲友,被称为欧阳修的“上弟”。欧阳修知颍州,吕公著为颍州通判,日夕与焦千之讲学,因敬重焦千之学问,延焦千之为师,教育子弟吕希哲等。后日,吕公著回京,携焦千之同行。焦千之为人“耿介不苟,终日危坐,未尝妄笑

^① 吕祖谦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卷七,《续金华丛书》本。

语”。严格督责弟子，“诸生有不至，则召之坐，面切责之，不少假借”。^①《荜阳学案》称：“诸子少有过差，伯强端坐，召与相对终日，竟夕不与之语。时先生（吕希哲）方十余岁，内则正献与申国夫人教训之严，外则焦师化导之笃，故先生之成就德器如此。”因此，吕希哲弟兄对焦千之很有感情。其后，吕希哲的弟弟吕希纯知颍州，曾专为焦千之在城南建造住宅，以报师恩，人称“焦馆”。^②

《伊洛渊源录》引《吕氏家传》又称吕希哲学于王安石。^③吕希哲于王安石相知很深。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，吕希哲少年已从王安石劝，绝意科举之路。王安石认为，“士未官而事科举者，为贫也。有官矣，而复事于此，是侥幸富贵利达，学者不由也”。后王安石当政，将安置其子王雱为讲官，即想到了有贤名的吕希哲，便欲先行起用。吕希哲虑及政见难免分歧，有碍交情，为了维护与王安石的情谊，便放弃了做官的机会，婉谢王安石举荐，说：“辱公相知久，万一从仕，将不免异同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矣。”^④一方要给官，一方为了维持感情而婉谢，其间可见王安石对吕希哲的赏识，也可见吕希哲对王安石的尊重与感情的珍惜。

吕希哲继执弟子礼于程颐。《荜阳学案》说：“正献相哲宗，先生遍交当世之学者。与伊川俱事胡安定，在太学并舍，年相若也。其后，心服伊川学问，首师事之。”^⑤程颐也称赞吕希哲为“一意正道者”。

①② 黄宗羲原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·庐陵学案》206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12月。

③ 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卷七引《吕氏家传》称：“公始从安定胡先生援于太学，后遍从孙先生复、石先生介、李先生觐、王公安石学。”

④ 《宋史》卷三百三十六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。

⑤ 黄宗羲原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·荜阳学案》902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12月。

吕希哲晚年转学佛。吕本中《师友杂志》说，吕希哲从高僧圆照师宗本、证悟师修颛游，尽其其道，别白是非，斟酌浅深而融通之，然后知佛之道与圣人合。

全祖望在《荜阳学案序录》总结吕希哲学术：“荜阳少年，不名一师。初学于焦千之，庐陵之再传也。已而学于安定、学于泰山、学于康节，亦尝学于王介甫，而归宿于程氏。集益之功，至广且大。然晚年又学佛，则申公家学未纯之害也。要之荜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，终得力于儒。”^①

自吕希哲后，经吕本中，这种家学风格世代延续并得以发展。《宋元学案·紫微学案序录》说：“大东莱先生为荜阳冢嫡，其不名一师，亦家风也。自元祐后，诸名宿如元城、龟山、鳧山、了翁、和靖，以及王信伯之徒，皆尝从游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。而溺于禅，则又家庭之流弊乎？”^②又说：“愚以为先生之家学，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，盖自正献以来所传如此。原明再传而为先生，虽历登杨、游、尹之门，而所守者世传也。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，其余大儒弗及也。故愚别为先生立一《学案》，以上绍原明，下启伯恭。”^③于是，吕祖谦集吕氏家学之大成，其以广大为心，最为突出。

首先，我们看吕祖谦对嵩洛关辅，也就是二程和张载的继承。

吕祖谦对二程的学术是既承了理学，也继了心学。程颐喜欢范祖禹《唐鉴》，以为此书“三代以后，无此议论”，“足以垂世”。^④又命人抄录，将其作为案上的唯一摆放物。吕祖谦则为《唐鉴》作注，以《唐鉴》议论多与伊川同。吕祖谦也接受了程颢的影响，清

① 黄宗羲原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·荜阳学案》902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12月。

② 黄宗羲原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·紫微学案》1233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12月。

③ 黄宗羲原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·紫微学案》1234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12月。

④ 《二程外书》卷十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